

● 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取向

徐 炜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徐炜(1961-),男,湖北罗田人,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

[摘要]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取向有三种:以社会为主导、以政治为主导及政治与社会并重的理论取向。三种取向着眼点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以探讨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目的。

[关键词] 政治社会学;研究对象;理论取向

[中图分类号] C 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3-0361-04

政治社会学自 80 年代中期引进国门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来学术界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更把政治社会学推到了理论的前沿,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然而,十几年来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也隐藏着令人担忧的一面,譬如研究者热衷于热点及专题的研究,而忽略基础理论方面的探讨。据本人初步统计,有关政治社会学研究对象、理论体系、方法等基础方面的论文不及 5 篇。这一缺憾成了制约政治社会学发展的“瓶颈”。迄今为止大学政治社会学专业教材仍未出“笼”不能不说与此紧密相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取向作一探讨。

一、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社会学在学术界可以说是“一个轮廓不很清楚的笼统称谓”^[1](第 15 页)。自政治社会学在 60 年代初正式诞生以来,有关政治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争就一直未曾间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内曾有研究者对这一论争作过分类统计,共有 5 种观点,即同一对象论、权力论、社会基础论、政治团体论、相互关系论。最近,有西方学者提出:“政治社会学是一个独立取向,它假定政治现象的本质是社会的,同时社会现象亦有政治性意义,也可以说,政治是一种社会性事件,而社会是一种政治性事件。在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学,本质上并不是处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社会’的关系”^[1](第 15 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除了反映政治社会学在西方飞速发展,并试图摆脱来自母体学科——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局限的愿望之外,并无新意,并未跳出传统的窠臼,只不过是词藻

上玩弄花样。笔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在本质上仍是处理“政治”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即关注“政治是如何决定于以及如何决定着社会中的其他事件的”^[2](第 1 页)。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过去曾是所有政治社会学者包括马克思、韦伯、帕森斯、李普塞特等大师关注的焦点,亦是当代政治社会学家研究的中心。关于这一点,可以从 A. M. 奥罗姆的《政治社会学》、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等著作中找到明确的答案,也可以从近年来我国学者热衷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中得出佐证。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几个具有卓越思想和洞察力的学者的贡献,政治社会学也是如此。对政治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学者有马克思、韦伯、帕森斯、李普塞特(S. M. Lipset)等。马克思的思想广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过政治社会学概念,但其有关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十分丰富,广为后来者所吸收。首先,他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解决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问题,清算了自古希腊到黑格尔为止西方学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认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3](第 192 页)。这一研究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同时也为政治社会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马克思关于社会冲突(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方面的研究,更是具体研究政治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典范。譬如,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发生的社会先决条件是都市化、传播媒介的发达以及政治化,与此同时发生的经济先决条件

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利润的下降、资本的集中、无产阶级化及其贫困化^[2](第 32 页)。正因为如此,西方学术界亦尊马克思为“政治社会学之父”^[2](第 14 页)。另一位稍晚于马克思的德国学者韦伯提出了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将研究政治现象的方向转向民众、转向社会角度,不再仅就政治论政治了。韦伯的后继者们正是从此出发而将目光聚焦在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上而开创政治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也成为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经典课题。在帕森斯构筑的庞大行动结构理论中,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政治子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关系,也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尽管帕森斯的研究重点不在这里,但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其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为最终政治社会学的脱颖而出可谓功不可没。李普塞特继承源自马克思、韦伯、帕森斯等思想家(包括米歇尔·托克维尔、帕累托等)有关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于 60 年代初出版《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社会学的正式诞生。李普塞特在该书中明确提出“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4](第 1 页),并且认为政治社会学虽然“不再提‘国家’与‘社会’,但一个更基本的两难推理,即冲突与共识之间的平衡问题,又在继续”^[4](第 3 页),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仍是李普塞特关注的焦点,只不过研究的层面更为深入、角度更为精确。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其复杂性不言而喻,上述诸位大师的研究只不过为探究这一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要界定“政治”与“社会”,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一切——或几乎一切——都带有部分政治性;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事物完全是政治性的”^[5](第 11 页)。所以,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政治”、“社会”两个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一些学者便根据研究的需要,而对这两个概念作出相应的界定。正因为“政治”与“社会”定义的这种开放性,使得政治社会学成为“一个轮廓不很清楚的笼统称谓”。笔者无意在这里厘定“政治”与“社会”概念的定义(事实上目前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打算围绕政治与社会,观察一下政治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取向。从这一论述中,我们也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大体说来,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来看,有三种理论取向:第一种是以社会为主导的理论取向,即从社会角度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第二种理论取向是以政治现象作为研究的中心,可以称之为政治主导取向,这种取向认为政治现象有其独立性和特殊的变化规律,同时政治亦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三种理论取向是政治与社会并重,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6](第 288 页)。

二、以社会为主导的理论取向

以社会为主导取向的理论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政治领域及其行为者并非是脱离社会事物的孤立的因素,而视这个领域是与所有的社会机构(如家庭)以及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2](第 1 页)。政治是受制于社会的衍生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

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由这个基础来决定。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变化,政治变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是典型的以社会为主导取向的理论。

结构功能理论也是属于以社会为主导取向的范围内的理论。如前所述,在帕森斯那里,政治体系只是从属于社会体系的一个子体系,其发展变化要受制于维持模式子体系、社会共同体子体系以及经济子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中,结构功能理论是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并且在这段时间,社会学对政治学影响又非常大,所以以社会为主导的理论取向成为这段时间的主要理论取向。

以社会为主导的理论取向除了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理论之外,我们可以从政治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中看到它的影响。下面我们从政治社会学的众多研究课题中选出三个课题看看这种理论取向。

1.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第 29 页)。政治文化的研究一般通过对个人政治取向的调查分析来进行,如派伊所云,它既“探究整体的国家与社会”,又“分析政治精英与一般人民的个人行为”^[8](第 1 页),因而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一个社会的政治脉络。

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当推阿尔蒙德及维巴的《公民文化》。他们历经 5 载,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 5 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们将政治取向设定为四种:整个政治体系、输入、输出、自我的政治角色,然而将政治文化划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为地域型的政治文化,上述四种政治取向都不具备;第二类为臣属型的政治文化,具备整个政治体系和输出取向,而缺少输入及自我的政治角色取向;第三类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四种政治取向都具备。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因此上述三种纯粹的政治文化不存在,只能作为学术分析的“理想类型”。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过度的政治参与不一定有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所以他们认为最能适应一个稳定的民主政体的政治文化,为混合了臣属型与参与型两种类型的所谓“公民文化”。

政治文化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达到顶峰,《公民文化》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70 年代以后略见衰退,但进入 80 年代后期,又出现了“政治文化的复兴”^[8](第 3 页)。在我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则是方兴未艾。

政治文化的研究之所以属于以社会为主导取向类别的研究,是因为一般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基本上是用社会因素来解释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类型。例如,用家庭结构、社会分层、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等来分析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当然也有学者用政治制度、政治事件等非社会因素来研究政治文化,但这不是研究的主流。

2. 民主政治社会条件的研究:

随着二战后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建立及其对民主政治理想的追求,促使一些学者对民主政治社会条件问题进行研

究,究竟哪些因素是民主政治建立和正常运行的必备条件,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会给发展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指出一条康庄大道。这种类型的研究在60及70年代十分热门,其核心课题是对促成民主政治建立的社会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的分析。

1959年,李普塞特发表了《民主必须的社会条件》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有关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李普塞特经过对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30多个英语国家以及20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比较研究,认为民主政治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才具备必要的条件。当国家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例如财富、工业化、都市化、教育程度越高,它的民主程度也就越高。他认为,工业化和都市化伴随着人口的增加,传播媒介的发达,会加快新闻消息的流传,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也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兴趣,因而民主也就有可能产生^[4](第24-46页)。

这一研究持续到90年代,印证了李普塞特的观点,不过,学者们使用更为精确的概念和统计说明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变迁引发一些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以致引起民主政治的出现。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社会经济高度的发展扩大了中产阶级,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同时带来大众传媒的发达,这样便增加了人际间的信任、政治知识、政治满足和能力感,最后增加了民主化的压力和它出现的机会。这一理论模型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以社会为主导的理论取向。

3 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

政治社会学非常注重权力的研究,故有学者甚至将政治社会学直接称为权力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研究权力通常通过研究社区权力结构进行,因为社区规模较小,可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调查,易于把握,但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故这种研究能见微知著,其成果可以推论及全社会。

社区权力结构研究开始于50年代初,迄今为止较著名的研究有F.亨特关于亚特兰大的研究、R.达尔有关新港的研究等。社区权力结构研究通常使用的方法有职位法、声望法、决策法和综合法。职位法就是通过分析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人物,找出重要职位中的实际领袖而了解权力结构的方法;声望法假定声望就是某种权力关系,通过调查声望高低而区别领导人的重要程度,从而了解社区权力分配的状况,亨特就是使用这一方法分析亚特兰大的权力状况的;决策法则以问题为研究重点,故亦称问题法,研究者一般参与一些社区或组织的会议,观察谁在决策中影响最大,从而分析社区权力状况,达尔是使用这一方法研究新港的;综合法则是在同一研究中使用一种以上的方法,即从职位、声望、决策等各方面去衡量领导人物权力的大小。这几种方法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社区权力的一般方法,据一位

美国学者统计,在全美已进行的61个社区权力研究中,使用声望法的有27个,决策法的有3个,个案研究的有18个,综合法的有13个^[9](第294页)。

社区权力结构研究是通过社区权力的来源、分布及使用来进行的,是以社会地位、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研究为前提的,所以属于以社会为主导取向的范围。

以社会为主导取向的研究除上述三个研究课题之外,还在政治社会化、政治参与、政治个性、政治精英、西方民主危机等研究课题占据主导地位,这里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三、以政治为主导及政治、社会双重的理论取向

如上所述,以社会为主导取向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注重政治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密切联系,以社会因素来解释政治现象,对一些政治现象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其理论局限性。因为政治现象毕竟有其独立性和独特发展变化规律的。另外,由于国家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所以近年来以政治为主导的理论取向日益增加。

以政治为主导取向的理论,突出政治因素的作用,特别强调对国家组织进行系统的研究,反对把政治现象还原为社会或经济、心理、文化现象,政治现象自产生以来,有其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因此应该从政治现象内部来研究政治。

以政治为主导取向的研究课题主要有:西方政治民主危机的研究,注重从政治方面来分析,而不是仅仅从社会方面来分析。例如,把西方的民主危机与国家组织的社会透明度的增加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国家自主性问题的研究,注重从政治内部分析国家自主性的条件等;政治领袖或精英的研究,突出个人对政治所起作用的研究;国家经济角色问题的研究,注重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家的福利政策的研究,国家的福利政策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密切相关,注重研究二者之间的联系。

上述以社会为主导及以政治为主导的两种理论取向各有其理论重心,前者以社会为主,后者以政治为主,但实际上研究者在研究中要衡量社会与政治孰轻孰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过分突出一方面的重要性,很可能会出现偏颇的情况,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与政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很难断定社会与政治因素的重要性。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政治与社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研究二者互动的关系,这种理论取向可称为政治社会双重取向。这种理论取向目前比较热门的理论是法团主义。法团主义亦称“社团主义”,虽然其思想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才崭露头角,成为近年来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有别于多元主义的一大理论流派。法团主义关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对国家和社会功能组织间常规性互动体系的概括”。“它认为国家是影响利益构成和团体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应当寻求在利益团体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11](第23页)。法团主义认为,根据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有两种不同的法团主义安排,即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前者代表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的作用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后

者指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关系,其中社会力量主导着关系的秩序,西方国家属于该种类型。可见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主导权力在国家和社会组织间的分布不同。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团体间的合作,是比较典型的政治、社会并重的政治社会学理论。

上述三种理论取向为目前学术界并存共立的研究政治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取向,功用各有不同,学者们各取所需为己用,孰优孰劣,不可一概而论。三种取向着眼点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以探讨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目的。

[参 考 文 献]

- [1] 张静. 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 [J]. 社会学研究, 1998, (3).
- [2] [美] 安东尼·奥罗姆. 政治社会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3]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4] [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5] [法] 莫里斯·迪韦尔热. 政治社会学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6] 黄绍伦. 社会学新论 [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92.
- [7] [美] G·A·阿尔蒙德, G·B·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8] 胡佛. 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 [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8.
- [9] 文崇一. 台湾的社区权力结构 [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9.
- [10] 张静. 法团主义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车 英)

Political Sociology: Research Object & Theoretical Tendency

XU Wei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U Wei (1961-), male, Lecture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political sociology.

Abstrac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heoretical tendencies of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making the society as the dominance; the politics as the domina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equally important. The footings of the three tendencies are different, but their purposes are the same. They all aim at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between politics and society—the object of study of political sociology.

Key words political sociology; research object; theoretical tendency